

陳正祥著

中國文化地理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中國 文化地理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书名提字：刘炳森
封面设计：宁成春

中 国 文 化 地 理

陈 正 祥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

香港分店：城多利皇后街9號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陝西人民印刷厂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16开本 21.5印张 345,000字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9,200

书号：12002·61 定价：6.00元

自序

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延續最久、影響最大的文化，它發源於黃土地帶，然後向周圍擴散；波及整個東亞，並向西伸入西域。在秦漢和唐宋時代，中國文化曾放發無比的光輝。自北宋王朝滅亡，漢文化開始失落；但在廣闊的漢文化圈內，經濟開拓繼續向南方發展，生產技術仍不斷有所改進。

漢文化基本上是農耕文化，特別是水稻的栽培。它愛好和平，建造城池來抵禦侵畧。農業的高度發展，需要適當的水熱條件。中國文化中心的從西北移向東南，一方面固然是受到遊牧民族的壓力，但也受到東南較佳生產條件的吸引。科學實驗知識告訴我們，在同樣的耕作技術下，愈炎熱濕潤的地方，農業生產的效果愈好。從華南而南洋，乃至澳洲的北部，都很適宜漢文化的發展；又因為漢文化是緩進的、和平的，它的自然發展會給各地的原居民帶來安定和繁榮。

十五世紀初葉明王朝偉大航海事業的中止，是漢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；中國的勢力從印度洋和東非洲退縮，給歐洲人以機會，讓他們紛紛搶奪新世界。明代中後期蒙古殘餘勢力的侵擾長城，倭寇的不斷襲擊東南沿海；兩面夾攻，更削弱了中國的勢力。亞洲人內爭方殷，歐洲人傾巢而出，侵佔了全部新土地。這是漢文化和歐西文明發生差距乃至優劣倒置的基本原因。到了十八、九世紀之交，歐洲的暴力終於侵入亞洲。歐洲人要掠奪亞洲的資源，並確保新侵佔的土地，關鍵在乎能否阻擋中國勢力的南下。因為當時在力量的對比上，可能抵抗他們邪惡勢力的便只剩下古老的漢文化。於是他們首先殘酷的屠殺漢文化前哨城市像馬尼刺、巴達維亞等地的華僑，後來又想出利用鴉片毒害中國的辦法。英國人大作鴉片生意，先摧毀中國人的健康，再麻痺中國人的意志，然後繼之以真刀真槍。

鴉片戰爭對漢文化的打擊是空前的，它揭穿了中國人的虛弱，破壞漢文化在東亞的傳統突出形象；科學和技術的相形見拙，使有烟毒後遺症的中國人失却自信。從此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力量，無法繼續向南擴張。中國過剩的人口無法向外移植，接着連漢文化本身，也受到了可怕的腐蝕，直到今天！漢文化圈的外圍，包括日本、朝鮮和越南，一向崇拜漢文化的，也受到了極大的震盪；開始懷疑這古老文化的優越性，相繼擺脫漢文化的影響，轉而接受歐西的文明。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稍後的所謂日英同盟，都是鴉片戰爭的附屬產品。

2 中國文化地理

優美中國文化的如此失落，好似美滿家庭因不肖子弟吸食鴉片而突然破產，會長期令人迷惘！中國文化經受這惡毒的打擊，難道永遠不得翻身？我不相信。漢文化如果真的不能復興，中國人就要永遠作世界的二等公民！於是發奮努力，多多旅行，用功讀書，最後還從台北轉到香港，想作一些實地的觀察，終於發現鴉片戰爭的邪惡意識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！

要挽救漢文化的沉淪，阻止它的繼續被腐蝕，進而恢復它固有的光輝，我想這一代的中國人實應負擔較多的責任。為達成此項目標，首先要認識中國文化，而我願以身作則。我一直是唸理科的，有了這個信念之後，就得改變我的研究方向，用文史哲的知識代替腦海裏的符號同公式。有幾段頗長的時期，我只讀中國的古書，樂而忘倦；所訂購的科學書刊，任其塵封。終因文史的根基太差，進步甚為緩慢。不過在我先後所發表的著作中，大致還看得出此項改變。

本書所收的十篇文章，大部分發表過，但不見得都很成熟。第一篇《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》，是1979年在日本廣島大學和國土地理院的講稿，稍後又刊載日本的《地理科學》季刊第三十二期。第二篇《方志的地理學價值》是1964年我就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時的就職演說，也就是英國制大學的所謂 *Inaugural Address*，曾經由該大學印刷發行。第四篇《北京的城市發展》，是國際研究中國之家於1977年出版《中國研究叢書》第三號《北京》一書的摘要。第六篇《長城和大運河》是劫餘殘卷，我在過去三十年間，對長城和大運河曾收集大批資料，包括地圖和照片，兩者皆可單獨成書；但1977年底離開中文大學時，大部分稿子都不見了。大運河的因為摘要油印過，部分賴以保存。第八篇《台灣的地名——文化層分期》曾作為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104號發表過，日文節譯刊載京都大學《人文地理》第十二卷第五期。第九篇《諸羅縣志之例》，曾發表於台灣省文獻委員會《台灣文獻》第九卷。上述幾篇文章，都或多或少經過了修訂。第十篇《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的完成》，是1979年對廣島大學有關研究生及教職員所作的歡迎聚餐前的講演，講稿曾經複印流傳。那次講演和餐會，有好幾位退休多年的老朋友從鄉間趕來參加，特別令人感動。

在學習過程中，我體會到文化地理和歷史地理實難以嚴格劃分；譬如地名，它是文化地理的一個構成部分，但却追隨歷史而不斷改變。我最近所寫的另外七八篇論文，體系倒比較完整，有朋友勸我應先發表《中國歷史地理》一書。但我總覺得中國靠歷史吃飯的人太多，對此應該特別小心謹慎；同時內地近年從地下發掘出了許多古文物，必定有一些可充實我的歷史地理著作，不妨再等待數年。因此才決定先出版這一本書。我知道應該提到而未能觸及之處尚多，可是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實在太忙，無法面面顧到；若有見缺失當，希望讀者指點和批評。

我的研究考察旅行，使我深信漢文化並非單獨屬於中國人，而是為整個東亞人民所共有。我和我的許多日本朋友，都認定漢文化是很優美的文化，特別是在精神

感召方面，否則它不可能延續得這麼長久；漢文化圈是一個偉大的地理單元，否則它不可能養活十二億人口。由於背棄漢文化，使得今日社會道德遭受嚴重損害的，也決不限於中國人。在物質慾望高漲，禮義廉恥淪喪的現代化社會，已經有人在追憶古老漢文化的美好了。

放眼世界，局勢激盪。我呼籲廣大漢文化圈人民的大團結，用較大的經濟、文化聯合力量，迎接非常艱難但也可能轉運的二十一世紀。我們要忘却過去的是是非非，而努力爭取將來。我們應該互相瞭解，加強合作。我一直就想通過我的學術研究，特別是文化地理的研究，能對促進漢文化圈人民的瞭解和合作有所貢獻。或許也就是這個心願，才引導我在艱苦的環境中不斷努力工作。

1980年9月25日於鯉城

目 錄

自 序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篇 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 | 1 |
| 一、漢文化的原始中心 | 1 |
| 二、逼使文化中心南遷的三次波瀾 | 3 |
| 三、南北地位的轉換 | 5 |
| 四、江南的開發 | 11 |
| 五、“東南財賦地，江浙人文藪” | 16 |
| 第二篇 方志的地理學價值 | 23 |
| 一、方志的特性、種類和分佈 | 23 |
| 二、方志的淵源和發展 | 25 |
| 三、方志所包含的自然地理資料 | 33 |
| 四、方志所包含的人文地理資料 | 42 |
| 五、八蜡廟之例 | 50 |
| 六、結論 | 58 |
| 第三篇 中國的城 | 59 |
| 一、引言 | 59 |
| 二、城的發展 | 60 |
| 三、城的功用 | 67 |
| 四、城的規模和形制 | 73 |
| 五、城的年齡 | 81 |
| 六、名城舉例 | 85 |
| (1) 長安 | 85 |
| (2) 南京 | 88 |
| 七、沙漠中的古城 | 91 |
| 八、連城和複城 | 96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篇 北京的城市發展 | 101 |
| 一、自然環境 | 101 |
| 二、城市的初期發展 | 105 |
| 三、元代大都的規劃 | 114 |
| 四、明代北京城的重建與改建 | 122 |
| 五、清代的園林營造 | 129 |
| 第五篇 黃土、黃土高原和黃河 | 135 |
| 一、引言 | 135 |
| 二、黃土的形成和分佈 | 136 |
| 三、黃土的特性 | 139 |
| 四、黃土高原 | 141 |
| 五、漢族農耕文化的發展 | 145 |
| 六、黃河 | 149 |
| 第六篇 長城和大運河 | 157 |
| 一、引言 | 157 |
| 二、長城的發展 | 157 |
| 三、明代修築長城 | 163 |
| 四、大運河 | 171 |
| 五、汴河 | 180 |
| 第七篇 論遊記 | 187 |
| 一、引言 | 187 |
| 二、遊記的種類 | 188 |
| 三、遊記中的遊記 | 192 |
| 四、史傳中的遊記 | 194 |
| 五、遊記的地理學記錄價值 | 196 |
| 六、風土記和遊記 | 197 |
| 七、從《東番記》到《裨海紀遊》 | 199 |
| 八、古遊記的整理和注釋 | 202 |
| 九、日記式遊記及其舉例 | 204 |
| 十、餘論 | 207 |
| 第八篇 台灣的地名——文化層分期 | 210 |
| 一、不同縮尺地圖所有的地名 | 210 |
| 二、常見的基本字和附加字 | 21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、文化層和地名的累積 | 214 |
| 四、移民和地名移植 | 218 |
| 五、土地開拓和地名 | 220 |
| 六、特殊地形和地名 | 222 |
| 七、主要物產和地名 | 225 |
| 八、先住番族和地名 | 228 |
| 九、地名的分合和轉變 | 230 |
| 十、台灣地名的分類 | 233 |
| 第九篇 《諸羅縣志》之例 | 235 |
| 第十篇 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的完成 | 251 |
| 索 引 | 257 |
| 附 錄：本書著者在1936—1980年間的著作目錄 | 269 |

附圖目次

| | |
|---|-----------|
| 圖 1 西漢人口分佈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 2 西漢人口密度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 3 西漢的三公和九卿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 4 唐代人口分佈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 5 唐代人口密度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 6 唐代的詩人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 7 唐代前期的進士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 8 唐代後期的進士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 9 北宋人口分佈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0 北宋人口密度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1 北宋的城市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2 北宋的詞人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3 北宋的詩人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4 北宋的宰相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5 明代人口分佈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6 明代人口密度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7 明代的進士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8 明代的三鼎甲 | 挿於22~23頁間 |
| 圖19 蝗神廟之分佈 | 挿於52~53頁間 |
| 圖20 明代北方蝗災之頻率 | 挿於54~55頁間 |
| 圖21 城之分佈與規模 (以上21幅地圖均採自陳正祥《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》) | 挿於72~73頁間 |
| 圖22 上海縣城圖(採自《重修上海縣志》) | 挿於78~79頁間 |
| 圖23 城的年齡(一)(二千年至三千年) | 挿於82~83頁間 |
| 圖24 城的年齡(二)(一千年至二千年) | 挿於82~83頁間 |
| 圖25 城的年齡(三)(五百年至一千年) | 挿於82~83頁間 |
| 圖26 城的年齡(四)(不足五百年者) | 挿於82~83頁間 |
| 圖27 唐代創建的城 | 挿於82~83頁間 |

- 圖28 宋代之軍寨堡** 插於82～83頁間
(圖 23-28 採自陳正祥《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》)
- 圖29 北京的位置** (採自陳正祥《中國地誌》第二卷) 插 頁
- 圖30 北京城的發展與遷移**(採自陳正祥《北京》一書) 插於108～109頁間
- 圖31 明代長城地圖**(採自張雨《邊政考圖》) 插於166～167頁間
- 圖32 《大唐西域記》敦煌石室寫本** 插於190～191頁間

附表目次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表 1 | 中國南北戶數增減的演變 | 10 |
| 表 2 | 明代文魁（狀元、榜眼、探花及會元）的籍貫分佈 | 22 |
| 表 3 | 1908 年及 1909 年上海縣的人口 | 47 |
| 表 4 | 進土地理分佈變遷之例（人數） | 48 |
| 表 5 | 河北省大名縣蝗災記錄 | 55 |
| 表 6 | 華北平原明代蝗災發生之頻率 | 56 |
| 表 7 | 北京的氣候記錄（1841—1956） | 103 |
| 表 8 | 明代的九邊 | 166 |
| 表 9 | 大同總鎮的城堡 | 168 |
| 表10 | 大運河的分段 | 173 |
| 表11 | 大運河各段的流向 | 173 |
| 表12 | 明代初期的漕運（每隔五年） | 177 |
| 表13 | 地圖縮尺和聚落形態對於地名密度的影響 | 211 |
| 表14 | 台灣地名的主要起首字 | 213 |
| 表15 | 大小與新舊等相對附加字所組成的相對地名 | 213 |
| 表16 | 安平、鹿港、淡水和基隆市街部分人口的消長 | 218 |
| 表17 | 林口台地以坑為名之地所佔全部地名的比率 | 224 |
| 表18 | 1920 年台灣行政區域重劃後地名的改變 | 233 |

第一篇 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

一、漢文化的原始中心

中國文化以漢族文化為主體，亦稱華夏文化或中華文化。漢文化最先發祥於黃河中游的黃土谷地，包括汾河、渭河、涇河、洛河、沁河等大支流的河谷；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遺物分佈的核心地區。此一地區，自然條件便利於原始農業的發展。其後向東擴張，進入黃河的大沖積扇以及太行山麓成串較小的沖積扇。遠在公元前4,000年，這一帶便存在着農耕的村落；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時代遺址，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⁽¹⁾ 大致到春秋時代，漢文化圈已掩有黃河的中游和下游流域。

黃土高原東南部黃河各支流的河谷，特別是兩岸的河坎（terrace），因為高出河流的洪水線，近水而可避免水害，又比較易於防禦，常被初民選擇為聚落地址。原生黃土有垂直的節理，便利於穴居；並且顆粒均勻，疏鬆易碎，性能肥沃，適宜於原始農耕。同時黃土高原東南部的雨水，因為很集中於夏季，勉強足夠農作物生長，所以便成為農耕和文化的發祥地。僅在關中地方，已經發現了四百多個仰韶文化的遺址，多數分佈在靠近河床的第一級河坎上。澧水沿岸在全長40公里內，發現了十三處遺址。山西省西南角發現了六十多處仰韶文化遺址，分佈密集，多數位於河岸的第一、第二級河坎上；面積概在10萬平方米左右，最大的超過50萬平方米。

漢文化圈繼續向外圍擴展，開始和少數民族接觸。在接觸地帶，先進的漢文化擁有較大的融和力量，於是文化圈繼續擴大。戰國時代，中原諸侯忙於互相征伐兼併，南方的楚族勢力向北伸張，進至淮河流域。北方的匈奴也乘機崛起，侵入肥美

1 此一遺址在渭河支流澇水的二級河坎上，建置於6,000年前，總面積約5萬平方米；中心部分是居住區，有許多圓形的、方形的房屋地基，地面堆積有生產工具、生活用具、糧食朽粒以及吃剩的螺螄殼和蚌殼等。每座房屋有一個或幾個窖穴。居住區附近還有製作陶器的作坊和氏族公共墓地。在居住區的外邊，圍着一條深寬各約5—6米的溝，顯然是作為防禦用的。

的鄂爾多斯草原。(2) 西方，漢民族循渭河河谷繼續向西發展，到達黃土高原的西陲。當時漢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動，以黃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為軸線，是東西向的。中國的幾個著名古都——長安、洛陽和開封等，皆分佈在此一軸線上。此一古文化之軸，以漢文化圈的傳統範疇說，偏在西北。

黃河下游流域的水、熱條件較中游為佳，農耕地區向東擴充是很自然的。漢民族開拓華北大平原後，農耕線（和畜牧地區的分界線）逐漸向北推移，可以容納較多的人口；而山東半島沿海，復有魚鹽之利。經濟和文化，相繼迅速發展。手工業和商業萌芽，交通路線逐漸開闢。早在戰國時代，邯鄲和臨淄等處，已形成為頗具規模的城市。

秦漢統一帝國建立後，由於政治和戰略上的原因，皆定都關中。為了供應京師，大力發展灌溉農業。但有一個頗長時期，關中的糧食供應仍需關東（黃河下游流域）補給。這些在史書上都有明確記載。東漢改都洛陽，原因之一是能够比較近便地接受東方糧食的接濟。在漢代的地理圖上，可見西漢的人口和物產，絕大部分集中在黃河的中、下游流域，南方幾乎等於空白。(3) 司馬遷曾經說過：“關中之地，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衆不過什三；然量其富，什居其六。”（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卷一二九）。當時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，尚屬“地廣人稀，火耕水耨。”(4)

東漢末年由於政局混亂和匈奴入侵，漢民族開始向南作較大規模的擴散；同時南方較佳的農業生產條件，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。討論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，只注意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，而忽視南方土地的引力，那顯然是不正確的。南方不但

2 鄂爾多斯（*Ordos, Ngörhtoszu*）在內蒙古自治區南部，包括黃河河曲以南，陝西省長城以北。歷史上曾為蒙古族鄂爾多斯部聚居之地。地貌上為一典型高原，頂面的保存尚屬完整，自中部向四周緩斜。中部海拔大多 1,300—1,500 米，東南邊河谷約 1,100 米。水系屬於黃河系統，但中部有大片內流區域，局部低窪處瀦成許多小湖沼。氣候從半乾旱過渡到乾旱，年平均氣溫 6—8°C，年平均降水 150—500 毫米，自東南向西北遞減。土壤為栗鈣土和棕鈣土。近百年來因中部和南部被開墾，草原受到破壞，流沙面積擴大。就整個高原而論，流沙面積佔土地總面積 9%，半固定沙地佔 11%，耕地佔 6%；再除掉荒山及湖沼，絕大部分實為草地。因地勢較高，雨水稍多，古代曾是主要牧場，成為漢族和匈奴爭奪的對象。匈奴頭曼單于侵入鄂爾多斯，秦始皇派遣將軍蒙恬率領大軍驅逐匈奴，收回鄂爾多斯。頭曼之子冒頓繼立，其勢又張；東討東胡，西破月氏，向北征服丁靈、鬲昆，南下又侵佔鄂爾多斯，控制整個蒙古高原，和漢族南北對抗。

3 陳正祥《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》，第一冊，國際研究中國之家出版，1979。

4 江南土地卑濕，人口稀少，農民向來用火耕水耨從事生產。所謂“火耕水耨”，便是燒去田間野草雜木，灌水種稻。草和稻並生，至高七八寸時一同割掉；再行放水灌田，於是草死而稻長。這種原始的耕作方法，生產量自然很低。《史記·平準書》應劭的注釋：“燒草下水種稻，草與稻並生，高七八寸，因悉芟去，復下水灌之，草死，獨稻長，所謂火耕水耨也。”

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（卷五三）：“唐都長安，而關中號稱沃野，然其土地狹，所出不足以給京師，備水旱；故常轉漕東南之粟。”這個時候，南方的經濟發展雖已趕上北方，南北均勢開始打破，但文化的中心仍在北方。

第二個使漢文化向東南推進的大波瀾是“安史之亂”，大唐帝國從此衰微。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經過浩劫，殘破不堪；繼之以藩鎮割據，政局動盪，於是居民離散，大量向南遷移；南方的州郡，人口顯著增加。此後在經濟發展上，南方已超越北方；北方依賴南方的接濟，愈來愈殷切。《全唐文·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府君神道碑》（卷六三〇）：“天寶以後，中原釋耒，輦越而衣，漕吳而食。”唐憲宗時代李肇所撰的《國史補》（卷下）：“凡東南邑郡，無不通水。故天下貨利，舟楫居多。轉載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，皆自通濟渠入河而至也。”由於商業及交通的發展，揚州和成都分別形成空前繁榮的城市。此時唐朝中央政府的財政，幾全部仰給東南。唐憲宗在元和十四年（819）七月上尊號時所下的赦書，就公然說：“天寶以後，戎事方殷，兩河宿兵，戶賦不加，軍國費用，取資江淮。”也就在這個時候，韓愈指陳“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。”⁵後來杜牧更進一步說“今天下以江淮爲國命。”

安史之亂對於黃河中下游的破壞實在慘重！亂平之後，創痍未復，而藩鎮的割據勢力，又日臻強大；兼以外患相繼，真是災難重重。《舊唐書·郭子儀傳》（卷一二〇）：“東周之地，久陷賊中，宮室焚燒，十不存一。百曹荒廢，曾無尺椽，中間畿內，不滿千戶。井邑榛棘，豺狼所嗥；既乏軍儲，又鮮人力。東至鄭、汴，達於徐方，北自覃懷（今河南武陟），經於相土（河南安陽），人烟斷絕，千里蕭條。”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（卷五三）：“（關中）北至河曲，人戶無幾。”

就人口減少的情形說，據李吉甫的《元和郡縣志》記載，長安所在的京兆府，開元時共有36萬戶，元和時還只恢復到24萬戶，比原先減少了三分之一。洛陽所在的河南府，開元時共有12萬戶，到元和時僅有1.8萬戶，減少了七分之六。

唐朝末期和五代的大部分時間，北方繼續混戰，黃河中下游流域不斷地遭受人禍、天災的打擊，終於暴露出衰蔽和蕭條的景狀，居民流徙，田園荒廢。北邊又有契丹的侵擾，漢民族遭到蹂躪和劫掠。相反的，偏安在江南的小國，爲了鞏固各自的政權，採取一些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，包括興修水利、獎勵農業，使南方的經濟和文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。北宋王朝的重建，有賴乎北方的人力和南方的物力，

5 韓愈《送陸欽州詩序》，見《全唐文》卷五五五。明代邱濬《大學衍義補》也曾指出天下的租賦，江南居其十九；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；而蘇、松、常、嘉、湖五府，又居兩浙十九，而蘇州尤甚。蘇州之田，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，而賦約天下十分之一弱。

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（卷五三）：“唐都長安，而關中號稱沃野，然其土地狹，所出不足以給京師，備水旱；故常轉漕東南之粟。”這個時候，南方的經濟發展雖已趕上北方，南北均勢開始打破，但文化的中心仍在北方。

第二個使漢文化向東南推進的大波瀾是“安史之亂”，大唐帝國從此衰微。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經過浩劫，殘破不堪；繼之以藩鎮割據，政局動盪，於是居民離散，大量向南遷移；南方的州郡，人口顯著增加。此後在經濟發展上，南方已超越北方；北方依賴南方的接濟，愈來愈殷切。《全唐文·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府君神道碑》（卷六三〇）：“天寶以後，中原釋耒，輦越而衣，漕吳而食。”唐憲宗時代李肇所撰的《國史補》（卷下）：“凡東南邑郡，無不通水。故天下貨利，舟檝居多。轉載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，皆自通濟渠入河而至也。”由於商業及交通的發展，揚州和成都分別形成空前繁榮的城市。此時唐朝中央政府的財政，幾全部仰給東南。唐憲宗在元和十四年（819）七月上尊號時所下的赦書，就公然說：“天寶以後，戎事方殷，兩河宿兵，戶賦不加，軍國費用，取資江淮。”也就在這個時候，韓愈指陳“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。”⁵後來杜牧更進一步說“今天下以江淮爲國命。”

安史之亂對於黃河中下游的破壞實在慘重！亂平之後，創痍未復，而藩鎮的割據勢力，又日臻強大；兼以外患相繼，真是災難重重。《舊唐書·郭子儀傳》（卷一二〇）：“東周之地，久陷賊中，宮室焚燒，十不存一。百曹荒廢，曾無尺椽，中間畿內，不滿千戶。井邑榛棘，豺狼所嗥；既乏軍儲，又鮮人力。東至鄭、汴，達於徐方，北自覃懷（今河南武陟），經於相土（河南安陽），人烟斷絕，千里蕭條。”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（卷五三）：“（關中）北至河曲，人戶無幾。”

就人口減少的情形說，據李吉甫的《元和郡縣志》記載，長安所在的京兆府，開元時共有 36 萬戶，元和時還只恢復到 24 萬戶，比原先減少了三分之一。洛陽所在的河南府，開元時共有 12 萬戶，到元和時僅有 1.8 萬戶，減少了七分之六。

唐朝末期和五代的大部分時間，北方繼續混戰，黃河中下游流域不斷地遭受人禍、天災的打擊，終於暴露出衰蔽和蕭條的景狀，居民流徙，田園荒廢。北邊又有契丹的侵擾，漢民族遭到蹂躪和劫掠。相反的，偏安在江南的小國，爲了鞏固各自的政權，採取一些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，包括興修水利、獎勵農業，使南方的經濟和文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。北宋王朝的重建，有賴乎北方的人力和南方的物力，

5 韓愈《送陸欽州詩序》，見《全唐文》卷五五五。明代邱濬《大學衍義補》也曾指出天下的租賦，江南居其十九；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；而蘇、松、常、嘉、湖五府，又居兩浙十九，而蘇州尤甚。蘇州之田，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，而賦約天下十分之一弱。

包括四川和荆廣的財富。⁽⁶⁾ 當時全國的經濟重點雖已偏處東南，政治和文化中心仍在黃河下游流域。北宋的統治階層，還是採擇“竭三吳以奉西北”的政策。在中國歷代的人口分佈圖上，北宋末年是南北均衡的。（參閱附圖9、10）。南方的經濟繼續穩定上升，南方人的政治和文化地位，也隨着經濟力量的上升而提高。北宋後期掌握中央政權的人物，南方人已佔多數了。唯此時全國文化的重心，仍在開封、洛陽的東西軸線上。西京洛陽的文化地位，似乎還超出東京的汴梁。

第三個逼使漢文化中心南遷的大波瀾是金人入侵，也就是所謂“靖康之難”。北宋的後期，漢文化已由鼎盛而轉趨靡爛；長期重文輕武的結果，對外族侵略幾乎完全喪失了抵抗的能力，以致很快就給半開化的女真族滅亡了。金人先後數度南侵，深入的程度和劫掠的劇烈，皆前所未見。⁽⁷⁾ 金王朝統治北方一百多年，以淮河及秦嶺為界，跟偏安的南宋政權對立。於是在時間上，北宋統一王朝的毀滅是中國文化中心南遷的真正分野，從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；而在空間上，淮河曾一時成為南北文化的界線。

其後蒙古崛起，撲滅金人，黃河中下游再受到嚴重的破壞，⁽⁸⁾ 人口和文物的南移繼續進行。南方因受到地形，特別是長江的保護，所受的戰爭災禍較少，有利於經濟和文化的發展，所以到了明代，人口和財富集中東南的現象就更明顯了。明代全國的商業，逐漸集中到長江下游和大運河兩條線上。萬曆六年（1578）全國商稅課鈔，南直隸一省達一千三百多萬貫，獨佔四分之一。（參閱附圖15、16）

三、南北地位的轉換

上節所說的永嘉之亂、安史之亂和靖康之難，都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南侵，造成中原地區的混亂，逼使漢族作大規模的遷移。但這只是促成中國經濟和文化中心搬遷的一部分原因，而並非全部原因。異族的侵擾，僅是一項推動（push）的力量。

6 王禹偁《東都事略》卷二三說宋太祖曾告訴他弟弟趙光義：“中國自五代已來，兵連禍結，帑藏空虛。必先取巴蜀，次及廣南、江南，則國用饒矣。”

7 在1129—1130年間，金兵繼續南侵，戰爭範圍擴大到浙江、江西及湖南，壓迫淮南人民再向南徙，一時渡江的人民，充塞於途。

8 元世祖忽必烈的近臣邢州人劉秉忠，奔父喪後奉旨還和林，曾對世祖說道：“邢州舊萬餘戶，兵興以來不滿數百，凋壞日甚。……”見姚從吾《張德輝〈嶺北紀行〉足本校注》一文，刊載國立台灣大學《文史哲學報》第十一期。